

关于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三个追问及其解答

谭 勇

摘 要: 关于马克思文化理论, 仍然有诸多问题未被学界加以充分研究: 其一, 马克思对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作了何种探索? 其二, 马克思是否提出了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 其三, 马克思可曾阐述过文化的“规训”功能? 通过考察马克思的相关著作, 可以发现, 首先, “现实抽象”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文化微观生成机制的关键, 它作为“文化产生于实践”之中介, 一方面连接人的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连接人的思维形式, 进而与文化相连; 其次, 掌握文化的思维具体以及考量文化冲突乃是马克思为文化叙事提出的基本前提; 最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 间接地阐述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作用。深化马克思文化理论的研究, 无疑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

关键词: 马克思文化理论; 文化叙事; 文化规训; 文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 A811.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3)02-0001-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30301.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增强文化自信……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P38-39)]这一论述不仅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同时也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 即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朝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 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法可以说是多样的, 但其中尤为重要的自然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深入把握文化的本质、特点及相关规律, 如此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马克思关于文化理论的阐发无疑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所必须加以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 由此,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文化理论。事实上, 学界关于马克思文化理论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 涵盖了文化概念、文化类型、文化市场、文化叙事、文化的实践基础、文化的社会性、文化的群众性、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等等。不过, 关于马克思的文化理论, 仍然有一些问题被学界忽视了, 而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无疑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的理解。基于以上缘由, 本文尝试探讨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 马克思对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作了何种探索? 第二, 马克思是否提出了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 第三, 马克思可曾论述过文化的“规训”功能?

一、马克思对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作了何种探索?

在深入讨论之前, 有必要对文化作一个界定。众所周知, 有关文化的定义是非常繁多的, 例如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1);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危机新变化及其批判研究”(TJKSQN22-003)

作者简介: 谭勇,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青年研究员, tany@lzu.edu.cn (甘肃 兰州 73000)

康德认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而言对随便什么目的的适应性……的产生就是文化”^{[2](P449)}，而黑格尔则认为“‘文化’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3](P68)}，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提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4](P1)}，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文化可以松散地概括为构成特殊群体生活方式的价值观、习惯、信念和惯例的联合体”^{[5](P39)}。可见，思想家们对文化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可以说，广义的文化概念实际上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表达了人类生活的整套的生存样态。

那么，马克思的文化概念有何涵义呢？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也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文化概念，“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因素”^[6]。的确，文化不仅体现在观念上、精神上，同时也体现在物质上、制度上、习俗上等。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重点探讨的文化，乃是观念意义上的文化，或者说精神文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等不重要，而是因为精神文化乃是人类文化最重要、最根本的文化形式，它最为直接地展示出人类拥有动物所不具有的认识和思维能力，同时还因为在所有的文化形式之中，精神文化的确具有主导性作用，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取得高级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在人类语言出现之后的社会阶段，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都或多或少地是在精神文化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精神文化加以深入研究，同时也会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在明确了本文所考察的文化是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之后，我们来尝试回答马克思究竟怎样揭示了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前，康德为人们揭示过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在马克思之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也为人们理解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说，康德和达马西奥关于文化微观机制的研究分别代表了先验哲学和神经科学流派对文化微观机制的探索，因而把握康德和达马西奥关于文化微观生成机制的论述，就不仅能够凸显出探讨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对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之揭示，还能在对比中更为明晰地凸显马克思关于文化的微观机制的揭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也是更具科学性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简要考察康德和达马西奥对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之论述。

首先，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先验哲学的阐发，勾勒了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康德指出：“我把一切不研究对象、而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就这种方式是先天地可能的而言——的知识称为先验的。这样一些概念的体系可以叫做先验哲学。”^{[7](P40)}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到，康德的先验哲学一定意义上是认识论的，因为它要探究的对象乃是人们关于对象的先天认识方式的知识。简言之，康德先验哲学试图阐明哪些先天知识在人们认识对象的过程中具有奠基性作用。事实上，在康德看来，空间和时间这样的先验要素、因果关系这样的先验逻辑以及先验图型、先验想象力等这些先天知识乃是人们认识对象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说，在康德那里，先验感性、先验逻辑、先验方法等标示了人类自身的特性。这就像海德格尔所说，“a priori 是那种在主体中，在内心中准备好了的东西，这种 a priori 是属于主体之主体性的东西”^{[8](P150)}。正是凭借对这些特性的运用，人类才能将纷繁复杂的人类经验转变为统一的知觉，“否则人类的经验只是一种不可能的混沌、纯粹无形式的、零碎的多样性”^{[9](P379)}。因为文化的形成在根本上不得不依赖于人们对对象的认识，而人们对对象的认识又离不开康德所揭示的先验逻辑、先验图型、先验想象力等先验要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对先验哲学的阐发揭示了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

其次，达马西奥抓住感受这个概念也阐发了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如果说康德并没有着意阐释自己的先验哲学与文化之间的微观联系，那么达马西奥则是特意要阐明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感受。在达马西奥看来，“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人类已经制造出了数量可观的器物，展

开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观念，这些构成了人们所共知的文化。人类文化包括艺术、哲学探询、道德体系、司法、社会治理、经济体制、技术和科学”^{[10](P1)}。在对文化作了界定之后，达马西奥问道：“人类的文化过程是为何又是如何开始的呢？”^{[10](P2)}这一问题的提出表明达马西奥力图阐明人类文化的起源。事实上，达马西奥承认人类文化的崛起离不开人类的创造性智力，但他同时强调，人类有意识的感受是人类文化得以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达马西奥认为：“如果早期的人类没有负向和正向的感受，那么高级的文化事业，如艺术、哲学探询、道德体系、法律和科学将缺乏一个最初的推动者。”^{[10](P157)}这一论述直接表明了达马西奥的观点，即他认为人类的感受是人类文化得以产生的最初的推动者。感受其实与情绪大致相同，它的“一端是疼痛和困苦，而另一端是安康和快乐”^{[10](P2)}。此外，达马西奥还认为，感受乃是心智表征个体生命内部状态的表象形式。这样，感受就与个体生命内部的运行机制联系了起来。因此，感受就是人这一主体的独特特质，也是主体得以认识对象，进而形成文化并发展文化的动力。总之，达马西奥通过强调感受在人类文化形成之中所具有的动力作用，从而在一定意义上阐发了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

最后，借助于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提出的“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可以发现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同样阐发了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1](P501)}文化毫无疑问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本质上也是实践的。而这就意味着，“文化的根本属性、文化的多样形态、文化的具体样式，都有其实践的源泉和基础，可以通过实践论来解释和描述”^{[12](P26)}。此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表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13](P430)}。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说劳动是文化产生的源泉，并且还指明孤立的劳动是无法创造出文化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明确的是，劳动乃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源泉，因为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劳动其实是由孤立的劳动转化而来的。总之，在马克思这里，人的实践或者说人的劳动乃是人类文化产生的基础和源泉。

然而，仅仅将人类文化产生的根源定位到人类实践或人类劳动，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人类劳动究竟通过怎样的微观运作形式产生了文化？在马克思那里，这一问题的答案比较隐晦，我们需要通过索恩-雷特尔概括的“现实抽象”概念来辅助回答这一问题。“现实抽象”实际上是索恩-雷特尔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商品形式时所涉及的商品抽象、价值抽象以及交换抽象所作的概括，它指的是一种不同于思维抽象的抽象，因而它不是由人的思维所产生的，而是由“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14](P10)}产生的。不得不承认的是，索恩-雷特尔认为马克思在关于商品形式的分析中涉及的正是“现实抽象”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15](P91)}。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到，当人们把各种劳动产品作为价值进行交换时，他们实际上就把凝结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具体劳动转化为了抽象的人类劳动，也就是说这里涉及了具体劳动到抽象劳动的转换。更直接地说，在人们的交换行动中产生了一种抽象。对于这种抽象，马克思认为它是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这就排除了这一抽象产生于人们的思维这种可能性，进而把这种抽象的起源限定到了人们的行为上。所以，可以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的确阐发了一种索恩-雷特尔意义上的“现实抽象”。

一方面，“现实抽象”产生于人的行动、人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现实抽象”虽然不同于思维抽象，但是它可以过渡到思维抽象，从而构成人的思维形式。当然，从“现实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进而构成人们的思维形式，在索恩-雷特尔看来需要格式塔转换、需要通过货币所实现的社会综合才是可能。事实上，马克思曾指出过：“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15](P93)}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恰恰谈到了“现实抽象”到思维抽象的过渡。

论述中提到的“种种形式”其实包括商品形式、货币形式等等,而商品形式本身就是抽象的,“抽象性整个地笼罩在它的周围”^{[14](P9)},并且它同样也是“现实抽象”,因为它是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人们的思维中产生的。所以,当马克思说商品形式等构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并且这些范畴最终表现为“客观的思维形式”的时候,就相当于说“现实抽象”最终表现为“客观的思维形式”。要点就在于,“客观的思维形式”是人们不得不内化进自己头脑中的思维形式,如若不然,人们就无法在充斥着商品形式或者“现实抽象”的社会中生存下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确实谈到了“现实抽象”能够过渡到思维抽象,并进而影响和构成人的思维形式。

“现实抽象”可以过渡到思维抽象意味着这样一点,即“由科学程序——当然是牛顿的自然科学程序——所预设、暗示的范畴机器,即以之把握自然的概念网络,已经呈现出社会功效,已经出现在商品交换这种行为中”^{[16](P10)}。也就是说,科学文化中用以把握自然的概念网络产生于人们商品交换行为中生成的“现实抽象”。其实,不仅科学文化,整个人类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都离不开人的思维抽象能力,而人的思维抽象又是受“现实抽象”的影响和作用的,因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现实抽象”。

分析至此,马克思所揭示的文化微观生成机制就变得清晰起来:首先,劳动或实践产生“现实抽象”;其次,“现实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进而影响并构成思维形式;第三,思维形式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奠定牢固根基。总之,文化产生于人的实践或劳动,乃是马克思文化理论最根本的观点,而通过考察“现实抽象”与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现实抽象”与人的思维抽象之间的联系,文化起源于人的实践之微观机理就得到了说明。

二、马克思是否提出了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

叙事是叙事学的核心,指的是“用一定的方式把事物、规律、主体等叙述出来”^[17],因而所谓文化叙事就是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把文化叙述出来。文化叙事属于叙事学范畴,而叙事学乃是“关于叙事的理论和系统的研究”^{[18](P3)},具体包括对叙事主体、叙事形式、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方法等的研究,因此关于文化叙事的研究也将涉及文化叙事的形式、结构以及方法等。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通过研究合适的文化叙事形式、文化叙事结构以及文化叙事方法,以便让中国的优秀文化有效地展示给世界,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这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关注的焦点并不在文化叙事的形式、结构以及方法上,而是聚焦在挖掘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上。也就是说,在当前时代,面对某一类型的具体文化,诸如共同体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先进文化等,要把它有效地叙述给全球各国,那么这样的“文化叙事”是否遵循着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前提呢?马克思有没有提出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呢?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体系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上,而根本没有给予文化以太多的关注,更谈不上为文化叙事阐发某些基本前提了。可以说,马克思根本就没有直接地、专门地阐发过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然而,如果仔细考察、研读马克思的相关文本,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推论出文化叙事的一些基本前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间接地阐述过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

第一,掌握文化的思维具体是文化叙事的一个基本前提。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特别强调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一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9](P25)}。要准确把握马克思所称许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离不开对“具体”这一概念的内涵的把握。“具体”在马克思那里拥有两

种内涵：其一是指“那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的具体物，即指感性的存在”^[20]；其二是指“思维中的具体性，指理解了的东西，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反映”^[20]。前者对应的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后者对应的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乃是人们认识对象所不可或缺的步骤，类似于人类主体从现实具体物中抽象出概念的思维过程。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仅仅停留在“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这一认识步骤上，那么人们得到的就只是“越来越稀薄的抽象”^{[19](P24)}，因而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在思维中把握具体。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乃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的普遍哲学意义的原理之一，并且在伊利延科夫（Ilyenkov）看来，“思维只有沿着这条唯一可能和唯一正确的道路，才能解决理论地认识周围世界的专有任务”^{[21](P110)}。事实上，马克思在提出这一方法时，就以“人口”这一范畴为例，阐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19](P24)}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口”这一范畴实际上包含有诸多规定，诸如阶级、雇佣劳动等等。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运用于“人口”这一范畴上，就意味着要用思维来掌握“人口”的具体，也就是说，在思维中将“人口”呈现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19](P24)}。唯有如此，我们对“人口”这一范畴的把握才是科学而准确的。

文化的思维具体与“人口”的思维具体是类似的，它意味着用思维来把握文化的具体，即在思维中呈现出文化的诸多规定和关系。如果抛开文化的思维具体，那么文化终究就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而以此为根基展开文化叙事，则这样的文化叙事也终究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文化叙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掌握文化的思维具体。只有在把握了文化的诸多规定及相应关系的基础上，文化叙事所欲实现的效果才能得到基本的保证。具体而言，文化的思维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其一，许多具体的文化形式，例如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二，文化的诸多规定以及关系，例如文化的实践性、文化的群众性、文化的社会性，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文化与阶级的关系、文化与主体的关系等。总之，作为文化叙事之起点的“文化”不能是抽象的、空洞的，而应当是经过了思维具体所把握的“文化”。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马克思所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间接地为文化叙事阐发了一个基本前提，即掌握文化的思维具体。

第二，对文化冲突加以考量也是文化叙事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列举了当代主要的八种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22](P24-26)}。各种文明之间当然有相互学习借鉴的一面，更有相互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在现代文明中，西方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造成了“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22](P29)}。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其普世主义信念的作用下，“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22](P285)}，这就毫无疑问地会使得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变得激烈且难以调和。需要注意的是，亨廷顿所论及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文化冲突，因为在他看来，“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22](P20)}。

事实上，亨廷顿所阐述的西方文明对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造成的冲击，马克思早就关注到了。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论及，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3](P36)}。这里提

到的资产阶级“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其实恰恰表明了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冲击。而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对东方文明形成冲击，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其关键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率先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这种生产方式的确具有巨大生产力，甚至连马克思都不得不称赞资产阶级在其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P36)}。因此，准确地说，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冲击，实际正是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由马克思所勾勒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冲击，直到现在都是仍然存在的。

中华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遭受了重创。不过，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非但没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中被资本主义所吞噬，反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新时代、在全世界展现出更强的生机、更大的魅力。当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仍然是有冲突的，或者更具体地说，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毕竟是两种根本属性不同的文化，因而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这种冲突目前最显著地表现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面，也就是西方国家在设法将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主义阵营中，诚如论者所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向发展中国家输送文化产品，如电视、电影、软件以及书籍等等。这些文化产品的输出，一方面给西方国家带来了高额经济利润，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强有力工具”^[24]。

总之，文化冲突在马克思那里已有论述，并且它在当前时代也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因此，考量文化冲突就应当是文化叙事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是因为，在面向特定群体或对象的文化叙事中，不论是为了引发文化冲突，还是为了避免文化冲突，对文化冲突的考量都会影响文化叙事的内容、方法等的选择。

三、马克思可曾阐述过文化的“规训”功能？

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人们所熟知的是，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同时人之成其为人也离不开文化。倘若没有文化的熏陶，那么就会出现类似“猪孩”“狼孩”的存在，而它们则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恰恰是文化作用于人这个方面，体现了文化的规训功能。

文化的规训功能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针对人的动物性而言，文化具有规训人之兽性的功能。对于这一点，康德作过明确的阐释，他指出：“规训防止人由于自己动物性的动机而偏离其规定，即人性。例如，规训必须制止他鲁莽地和轻率地冒险。因此，规训只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它是用来对抗人类的天然野性的。”^{[25](P438)}康德在此非常明显地将规训与人的动物性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规训的作用正是为了限制人的动物性。当然，康德在这里并没有直接表明是“文化规训”限制人的动物性，而仅仅提及“规训”限制人的动物性。不过，康德提及的“规训”的确是指向了“文化规训”，因为他的上述观点以“人类是唯一必须接受教育的生物”^{[25](P437)}为基础。教育直接指向了文化教育，是人类特有的文化活动，因而康德论及的“规训”其实正是“文化规训”。另外，达马西奥比康德更为直接，他明确表示“文化的任务之一就是驯服这种经常出现的、作为人类起源的残存物但依然活跃的兽性”^{[10](P150)}。因此，文化规训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对人的动物性进行规训。

第二，文化规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人的身体的规训。文化对于人的思想的作用应当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文化对于人的身体的规训则通常为人们所忽视。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探究权力的微观运行机制时，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26](P155)}，人的肉体是被权力操纵、塑造、规训的对象，由此展示了文化对于人的身体的规训作用。《规训与惩罚》的副标题是“监狱的诞生”，监狱是权力的重要且显明的构成部分，并且监狱

对人的身体的控制是一目了然的，它使犯人与外部世界隔离、严格控制犯人的作息时间等。在福柯看来，认为监狱与新法典一起诞生的观点乃是错误的，实际上，“监狱这种形式在刑法体系系统地使用它之前就存在了。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他们进行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精力，训练他们的肉体，把他们的连续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彻底可见状态，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察和记录机器，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时，监狱已经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26](P259)}。由此可见，福柯是将监狱的诞生定位到了规训社会上，也就是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来控制社会成员的肉体之时，监狱的形式就在这时生成了。

那么什么是规训社会呢？简单说来，在福柯眼里，规训社会就是一种大型的“监狱”，其中充斥着权力通过微观机理控制人的肉体的各种机构、技术。这些规训机构包括宗教团体、慈善组织、公学校、医院、工厂，甚至家庭等，而其规训人的肉体的技术则包括：其一，分配艺术，主要涉及对空间的分配，例如通过构建“单人密室”“场所”“座次”等空间等级体系来确保每个人的顺从；其二，对活动的控制，例如通过时间表对人的活动进行严格控制；其三，创生的筹划，即权力通过控制时间的序列化，将其与个体的成长、进步相联系；其四，力量的编排，即权力为了获得一种更高效率的机制，而把单个个体的力量组织起来，包括将单个肉体变成“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他肉体结合的因素”^{[26](P184)}、将肉体“置于一个小小的信号世界，每一个信号都联系着一个必须做出的反应”^{[26](P187)}等。总之，规训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以人的身体为规训对象的权力规训机制和规训技术，并且这种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26](P188)}。显然，我们从福柯的分析中看到是权力规训机制和权力规训技术对人的身体的规训，而并未看到文化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作用。不过，权力规训机制和权力规训技术本身不就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吗？换言之，它们不就是一种权力文化吗？因此，福柯所揭示的权力规训机制和权力规训技术对人的身体的规训，恰恰意味着文化本身对人的身体的规训。

在明晰了文化规训的两个主要内容之后，我们需要回答的是，马克思可曾阐述过文化的规训功能？就文化具有对人的动物性进行规训这一方面来说，马克思并无相应的论述。不过，就文化对人的身体进行规训这方面来看，马克思曾论述过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大核心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资本主义文化是由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当被视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部分。正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15](P484)}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机器的使用，迫使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而这正是对工人肉体的典型的控制。此外，马克思还曾指出：“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15](P488)}这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厂中发现了“兵营式的纪律”，问题就在于，这种“纪律”在福柯看来，恰恰就是权力能够借以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26](P155)}的方法。也就是说，“兵营式的纪律”展示出工人在

工厂中受到了严格的管控、规训。另外,马克思还表明:“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15](P486-487)]这一论述非常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机器的使用造成了工人身体的损害,而这当然也是对工人肉体的规训和控制。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尽管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大机器工业对人的异化式规训和控制,但他也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积极意义,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P36)]。因此,对于马克思所阐释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对人的异化式规训和控制,也应当辩证地看待。

综合来看,可以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间接地阐述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作用。具体而言,马克思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身体的规训和控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确阐述过文化的规训功能。

四、结 语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以及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无疑需要从马克思文化理论中汲取理论资源。尽管学界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基础上,对马克思文化理论展开了多维度、系统性的研究,但关于马克思文化理论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追问和探讨。本文紧密围绕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尝试回答了有关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马克思对文化的微观生成机制作了何种探索?第二,马克思是否提出了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第三,马克思可曾阐述过文化的“规训”功能?首先,文化产生于人的实践或劳动,乃是马克思文化理论最根本的观点,而通过考察“现实抽象”与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现实抽象”与人的思维抽象之间联系,文化起源于人的实践之微观机理就由此得到揭示。其次,马克思为文化叙事提出的基本前提有两个:其一,掌握文化的思维具体;其二,考量文化冲突。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间接地阐述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作用。事实上,文化本身是复杂的,文化实践、文化市场、文化资本、文化叙事、文化规训等均有其特有的规律,因而在21世纪,若想繁荣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那么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特别是深化马克思文化理论的研究,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李秋零主编.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3]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4] [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5] [英]伊格尔顿. 文化的观念[M]. 方杰,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6] 王仲士. 马克思的文化概念[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 [7] 李秋零主编. 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8] [德]海德格尔. 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M]. 赵卫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9] [美]塔纳斯. 西方思想史[M]. 吴象婴,等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 [10] [葡]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万物的古怪秩序[M]. 李恒威,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卢文忠.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种批判性的研究[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

-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4][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M]. 谢永康, 侯振武,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6][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 [17]孔明安. 论马克思主义的三重辩证叙事方式[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11).
- [18][英]马克·柯里. 后现代叙事理论[M]. 宁一中,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20]吴传启. 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J]. 哲学研究, 1962(4).
- [21][苏]伊利延科夫. 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M]. 郭铁民, 等译.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 [22][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M]. 周琪, 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2.
-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24]周勇. 文化冲突态势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J]. 求索, 2015(10).
- [25]Kant, I.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Educatio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6][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Three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Marx's Cultural Theory

TAN Yong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Marx's cultural theor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aiting for full study. First, what exploration did Marx make on the micro-generating mechanism of culture? Second, did Marx put forward the basic premise of cultural narration? Third, did Marx elaborate the "discipline" function of culture? The review of Marx's relevant works suggests that, first of all, "real abstraction" is the key to the micro-generating mechanism of culture revealed by Marx. As the intermediary of "culture comes from practice", it connects with people's practical activities, with people's thinking forms and with culture as well; Secondly, mastering the concrete thinking of culture and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conflict are the basic premise Marx put forward for cultural narration; Finall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Das Capital*, Marx indirectly expounded the disciplinary role of capitalist culture on human body. Further study of Marx's cultural theory is constructive to the sharing of Chinese stories and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Marx's cultural theory; cultural narration; cultural discipline; cultural practice

(责任编辑 孙 洁)